

# 台湾的非营利组织与公民社会建构

王 茹\*

[摘 要] 非营利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其参与治理公共事物已成为全球潮流。台湾的社会力从威权时期长期被严厉压制下的状态下奔流而出，成为政治转型的重要推力。随着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社会运动型的社团向着比较常态的、正式的非营利组织回归。台湾的非营利组织也获得很大发展，并已参与治理台湾的公共事物，“社区总体营造”和“9.21 大地震”的救灾及灾后重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官方主导和民间自发两种不同的方式与路径。

[关键词] 公民社会 非营利组织 治理 社区总体营造 “9.21 大地震”

在全球范围内，非营利组织发展迅速，广受重视，参与治理公共事物已成为普世性的潮流之一。台湾的非营利组织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当前在很多方面都有长足进展，并开始参与治理台湾的公共事物，“社区总体营造”和“9.21 大地震”的救灾及灾后重建，就是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本文试图在阐述相关的理论与概念的基础上，对台湾非营利组织的历史进行考察，并结合当前实例来初步分析在台湾所谓的公民社会建构中，台湾的非营利组织所发挥的功能与作用，及其与台湾“政府”之间的关系。

## 一、理论概述

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理论在 1980、1990 年代的流行有其国际背景<sup>[1]</sup>。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一种深化民主的重要的政治思潮。公民社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热点话题。公民社会理论的主旨是倡导公民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西方左翼的公民社会理论家一般认为，保持活跃的、强大的、参与性的公民社会，不断扩大社会自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民主至关重要；公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sup>[2]</sup>戈登·怀特 (Gordon White) 定义公民社会为“它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sup>[3]</sup>这样，中介性的社团领域所指称的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组织等等就成为公民社会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的一大热点。其实，早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社团对民主社会、民主政治的功能就受到重视，“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莫过于美国的智力活动和道德方面的结社”、“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的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活动的进展”。<sup>[4]</sup>现代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对意大利南北两个社区的研究表明，社团组织的发达与良莠与否对民主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sup>[5]</sup>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治理理论则进一步对社团和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的关系更深入进行研究。过去人们将公共事物的管理或者说公共物品的提供看成是政府的天然职责。然而，人们经过公共物品的属性进行研究，发现因为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果纯粹由市场机制或私人机构提供时，会产生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或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等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sup>[6]</sup>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现代政府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经济与社会职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带来了公共支出扩大、财政负担过重、政策效率低下、“公有地的悲剧”等“政府失灵”的问题。治理理论认为，要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就需要有活跃的、参与式的第三部门（或称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参与进来，而且政治必须从统治（government）走向治理（governance），理想的政治目标须从善政（good government）转变为善治（good governance），统治是自上而下的，其权威只能来自政府，是一元中心式的，而治理则是上下互动，权力双向运行的合作网络式的过程，其权威并非来自政府，而是民众的认可。<sup>[7]</sup>治理要扬弃中央集中式的权力机制和组织结构，代之以多组织、多层次、多中心的决策模式和合作参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本质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sup>[8]</sup>总之，善治依靠的是公民自愿的合作，善治的基础就是公民社会，因此，从权力关系和权威认同来看，善治实际上就是国家权力回归于社会。在这个理论框架下，非营利组织就成为治理的核心要素之一，它通过公民自愿结社而成的组织为公民走出私人领域，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和手段，也提高了他们的参与能力和水平。在众多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治理变革中，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政策已成为一种潮流。

非营利组织，常常与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组织、社团等名称混同使用，而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它所具体指称的部门与组织如公共慈善组织、自愿组织、基金组织、公益法人等等所包括的范围也不完全一样。但它大致可以定义为政府、市场之外的民间组织，其本质是个人自愿组成团体谋求互利或公益，具有私立、非政府、非营利、独立运作、促进社会公益、公民自愿加入、财务自主、免税、赢余不做分配等性质。<sup>[9]</sup>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非营利组织的地位和功能十分发达。1990年代中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莱斯顿·萨拉蒙教授主持了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全球比较研究项目，在26个国家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国家非营利组织的支出总额高达112000亿美元，为其工作的雇员相当于3100万全职雇员。<sup>[10]</sup>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电脑网络的发展，非营利组织早成为一个跨国的现象，在全球性治理的问题上例如全球环境与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地区冲突、防治传染病等方面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Civil Society”在中文中原本有三个不同的译名“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这三者语意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sup>[11]</sup>台湾学者最初喜用“民间社会”这一称谓，取其“民间对抗‘政府’”之意，<sup>[12]</sup>而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公民社会”的使用频率渐增。这一词语使用上的转变已经稍稍透露出台湾在政治转型前后“社会力—‘政府’权威”角力的不同途径或方向。如果说“民间社会”主张对抗，那么“公民社会”在保持自主性的前提下，则更多主张的是自愿参与、合作、竞争。这一时期，台湾的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非营利组织，根据其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抗争型和社会服务型两种类型。在政治转型的国家和地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及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一般而言，在政治转型发生前后的一段时期，不但抗争性的非营利组织，甚至连一般的社会服务型的非营利组织，都会卷入到社会政治运动与斗争中；到了政治转型已比较稳

定的时期，抗争型的非营利组织发起的运动与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力度不如以前，而且自身还可能会朝社会服务型转变。1990年代中期台湾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台湾“政府”开始吸纳一些非营利组织参与某些公共政策。建构公民社会自1990年代以来也成为台湾“政府”、学界、社运界探讨和实践中的议题。

## 二、台湾社会力的兴起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迄今为止，台湾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威权统治时期，直到1970年代末期，非营利组织受到国民党政权的严厉压制和控制，自主性的社团几乎不存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期间，“戒严体制”是一个对社会实行高压与渗透性统治的体制，社会的自主性被挤压得几乎不存在。国民党实行“党禁”，虽没有正式地否认人民的结社权利，但是实际上却将各种结社全部地纳入到国民党的“党政”体系里，几乎所有的社会团体或组织都必须在官方的控制之下，或由官方包办。所有的职业性公会及工会都由“政府”出面成立，国民党垄断其代表成员的产生。非职业性的社团每一类型仅仅只能组织一个，而且被限制在单一区域的层次上。这些团体实际上由国民党的特种党部组织负责其运作，工会、商会、农会、渔会、妇女等社团组织基本上都由国民党把持。其他零星存在的一些慈善性组织如红十字会、基督教儿童福利基金会等，获得了生存，因其显然不会触及政治敏感线；而一些联谊性组织如青商会、扶轮社、狮子会等，则属于工商业精英进行社交联谊等活动的机构。许多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缺少公开的参与和辩论，所有相关公共政策的形成只能依赖于国民党的一党偏好。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什么兴趣进行政治与社会结社。

第二阶段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台湾的社会力破土而出，出现了大量的社会运动型的社团，不仅社会运动迅猛发展，而且“社会力对抗‘政府’权威”的态势明显。1970年代，台湾岛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变，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遭到了沉重的打击。<sup>[13]</sup>同时，台湾社会已经从农业社会发展到价值多元的现代工商业社会，本省籍的工商精英已经在经济上占到了上风，各群体各阶层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要求对政治权力和政治价值进行重新分配，要求社会改革。1970—1980年代台湾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或促使受害者自发地起来抗争，或使一些人出于公益，组织起社团，发动社会运动，向当局施加压力。消费者组织如“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和一些反环境污染的社运团体是其中比较突出的。劳工、农民、妇女、学生、知识界、原住民等社会群体也逐渐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初步形成了一些具有较强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团体。总之，社会力已经不可阻遏地突破高压政治的封锁。随着社会力的释放，台湾民众的结社行为大为增加，1980—1990年间参加社团的人数增加了2倍，达到2700多万人次。<sup>[14]</sup>研究也发现1980年代中期台湾民众的政治参与态度正处于转型阶段，多数民众对政治参与的自主性权利意识正在发展。<sup>[15]</sup>台湾民众结社行为的增加和自主性权利意识的兴起，表明他们通过对自身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关切，走出了狭隘的私人领域，改变了过去对公共生活的漠然态度，显示了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这也是当时台湾社会运动频频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解严”之前的1980—1986年，消费者运动、反污染自力救济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原住民运动等就已经出现。而各种运动和自力救济行动中的肢体抗争与暴力对抗，诸如挡街、阻路、围攻、骚乱等等不时见诸于社会各个角落，社会秩序难以为续。这让国民党感到了过去可以任由其支配的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不得不调整政策，1986年开始政治改革，随后又解除“戒严”。然而控制支配的体制一旦松动，社会力就更加猛烈地爆发出来，

不仅原有的各种运动在继续发展，而且新出现了劳工运动、教师人权运动、残障及福利弱势群体、政治受刑人人权运动等政治性更强的运动，连一向保守的农民也在 1987—1989 年发动多次规模较大的街头抗议行动。<sup>[16]</sup>1987—1989 期间，社会抗议运动共同形成了强大的合力，不仅数量规模不断地扩增，而且与政治反对运动的联系越来越深，政治冲击力更强，推动着民主运动向高潮发展，这趋势一直延续到 90 年代中期。民进党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挑起并吸纳其它社会抗议运动的力量，壮大自己。因此，在这一阶段，民间社会这个词语，正是体现了“民间对抗‘政府’”这一指向，社会运动团体和民众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社会抗争运动和示威活动，在总体上都指向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因此，“社会力—‘政府’权威”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处于对立的状态。这对台湾政治转型的发生当然有其重要的意义。

第三阶段是 1990 年代中期以来，非营利组织回归常态，并参与公共治理。随着台湾政治发展的进程，台湾的社会运动也进入了一个转变时期。据台湾学者研究，约在 1993 年左右，抗争和示威游行大量减少，从街头行动转变为专业游说，抗争的发动者由民众转移到专家，发生了所谓“社会力的驯化现象”。<sup>[17]</sup>台湾很多社会运动组织对于发动抗争运动的兴趣在下降，并开始试图摆脱强烈的抗议性格，回归到比较常态的民间社会及社会服务的运作轨道上来，转型为正式的非营利组织。除了台湾威权体制瓦解、民主化有所进展等政治制度因素外，有人认为，这一转变与社会运动的组织化、组织技术有很大关系，以往上街、阻路、围攻、骚乱等街头抗议运动冲击社会秩序，抗争的民众和社团背负着制造“乱像”的压力，不仅在实践过程中因为组织化和组织技术的成熟而越来越“理性”，而且随着组织化与组织技术的发展使得精英成为了领导者、运动者，他们大多数属于专业经理阶级，更偏好专业路线。<sup>[18]</sup>自 1989 年《人民团体法》修正后，台湾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势头一直不减。现在台湾以基金会形式存在的财团法人，有 3100 多家，而以人才为主的社团法人，更达到了 19500 多家。台湾的非营利组织已经不仅仅是引领民众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主要动力之一，并且已经开始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因为它们多数能够深入民间或扎根于社区基层，又具有公益的性质，更能动员民众，将民众的实际需求与建议反映给当局。在台湾，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政策方式主要有政策倡导、游说、诉诸舆论、自力救济、涉入竞选活动、策略联盟等等。1990 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在施政过程中，开始注意吸收一些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规划与执行；非营利组织也越来越多地寻求与“政府”合作，或承办各种“公办民营”的政策措施，或积极介入立法、修法，如在消费者保护、环保、医疗健康、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可见到非营利组织活跃的影响。所谓建构台湾公民社会的思潮也在官方、学者和社会中间得到了传播与认同。公民社会这一词语也越来越频繁地见诸于主流媒体和社会舆论当中。

从这样的发展历程来看，台湾社会力的浮现及其集结起来，共同推动政治转型的发生，为公民社会奠定了一个可供发展的基础，而非营利组织的蓬勃兴起，更开启了建设公民社会、参与治理的希望之门。但是，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权威的角力，在建构公民社会、参与治理公共事物的过程中，并没有停息。台湾当局力图吸纳、驯化民间社会力，而一些非营利组织和社团，则力图自主地展开行动。“社区总体营造”就是由官方所主导，一些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建构所谓的“公民社会”和“国家认同”的社会工程；但在“9·21 大地震”的救灾及灾后重建过程中，台湾的非营利组织则相对自立地提供了一个建构公民社会、进行治理的一个范例。<sup>[19]</sup>这两个事例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体现了官方主导和民间自主不同的方式或路径。而台湾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台湾公民社会的建

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 三、台湾非营利组织参与治理的两个事例

台湾相当多的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总体营造”和“9·21大地震”救灾及灾后重建中的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公共事物的治理。

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初，社区热潮开始在台湾浮出水面。一些社会运动团体扎根社区，培植实力，期望获得长远发展；不少地方文史工作者基于爱护乡土的情怀，想要在社区挖掘培植本土文化；许多乡镇与城市的居民则自愿结合，发起各种活动，期望改造社区品质，提升生活质量。这是台湾社会草根力量的显现，体现了基层民众对草根民主的要求和对公民社会的期望。但是从1994年起，台湾当局开始推动“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声称要动员民众参与社区空间的营造过程，参与地方文化并使之精致化、生活化，以重塑文化认同、建立社区意识、凝聚“国家”公民意识和“生命共同体”意识。这一政策纳入了相当多的民间非营利组织。据统计，全台约有210多个基金会、工作室、学会、协会这样的非营利组织，参与了这一政策。在这样社区营造活动中，很多参与的非营利组织或接受相关部门委托辅导社区，或者与社区结盟向这些部门提案申请补助。其中的一些非营利组织为此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协助台湾当局展开诸如培育社区人才、保护与再造社区环境、振兴台湾的地方文化、发展文化产业、举办生活文化活动、保护古迹等等项目和活动，很多地方展开的社区活动也颇为热闹。

然而这一政策出台的大背景是台湾的“国家”权威和合法性受到冲击，而“政治本土化”来势汹汹，在这种情况下，李登辉等人就要借着这样一个由官方主导的社会工程去营造“新国家认同”。这一政策的政治本质是要建构“新的国族主义，召唤人民认同新国家，其方法为培养来自土地原始认同的共识，以及建构新的族群”。<sup>[20]</sup>它在整体上就是由当局“由上而下”地贯彻建构“新国家意识”的工具，因此，这是一个重新凝聚“‘政府’（‘国家’）权威”的过程，并没有把权力和权威真正回归于社会。在实际的政策过程中，官方并不会主动将自己“贬低”为非营利组织的合作者，它仍然要居于上位，掌握着资源，优势是明显的。非营利组织只能迎合官方的目标，它们中不少忙于弄计划要经费办活动，表面上助长了社会参与的风潮，然而无助于社区内居民自主性和自治性的提高，也即建构公民社会最为基本的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同时，很多非营利组织接受“政府”的资助后，往往更降低了本来就比较缺乏的自主意识和批判意识，往往形同被收编。社区总体营造所鼓吹的“社区意识”，如果没有辅之以平等交往、民主协商和保护公民个人权益等条件，即使在台湾社会内部，也会很容易就蜕变为保守主义的温床，或局限于狭隘的区域意识里。<sup>[21]</sup>在实际的社区营造的个案中，主要仍然是一些精英在主导，普通民众虽然被一些公共活动所吸引，有了一些低层次的公共生活，但距离积极地介入公共事物、培养民主参与意识还相当遥远。因此，在“社区总体营造”中，并没有显现出所谓的“第三部门、政府、社区”的民主治理态势。<sup>[22]</sup>

“9·21大地震”的救灾及灾后重建，是台湾的非营利组织自发地参与治理的一个典型范例。1999年9月21日，台湾以南投县、台中县为中心发生了里氏7.3级地震，由于是浅表型地震，破坏较大，总共死亡2400多人，房屋倒塌损毁2万多间。这次大地震的救灾及灾后重建中，台湾非营利组织表现亮丽，而台湾“政府”则多为人所诟病。灾后四小时之内，有关的“政府”部门还未有任何的行动，就有慈济功德会组织了义工和医疗团队，抵达灾区，迅速地展开救援、赈灾、安抚工作，发挥了巨大的效用。在救灾期间，媒体热情地呼吁爱心捐

款，各团体、组织、学校、公司及媒体纷纷打出捐款账号，民间捐款达到了 375 亿多的新台币。台湾各地的许多社团组织、社会力量和个人都行动起来，自行集结组织前往灾区，纷纷运送民生与救援物资，参与各种救灾与重建工作。一些社会福利团体，除了去做救援与重建工作外，当台湾“政府”部门还未想到协调资源与管理募款的办法时，他们在 1999 年 10 月 7 日就已经自主地建立了一个自力的民间的赈灾资源监督机制——“‘全国’民间灾后重建协调监督联盟”（后改为“‘全国’民间灾后重建联盟”），由李远哲担任总召集人。<sup>[23]</sup>民间的慈善机构认养、承建的房屋或公共建筑不论在质量还是在资金使用效果上都比“政府”高很多，例如王永庆承建的灾区学校每坪成本仅 2.7 万新台币，而公共发包的索价高达 20 万~46 万新台币。<sup>[24]</sup>民间普遍对新旧“政府”的救灾不力、重建拖沓表示不满，台湾“‘全国’民间灾后重建联盟”在 2000 年 3 月公布的第一次民调显示了灾区民众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严重不满，而 2000 年 9 月公布的另一次民调中灾民也给民进党“政府”打了 59.12 的不及格分数。<sup>[25]</sup>虽然在救灾及灾后重建中，从总体上讲，台湾“政府”依然是主导性的，非营利组织只是扮演合作与协助的角色，但是，非营利组织除了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自动性、自主性和行动力外，其自发地成立“‘全国’民间灾后重建联盟”等行为也表明了某种自治性，对“政府”的公权力不无冲击之处。<sup>[26]</sup>

“9·21 大地震”虽然非常残酷，但是台湾社会和民众却从救灾与灾后重建中感受到了社会自身蕴涵的巨大能量，台湾社会之所以能够历经劫难而不倒，这种社会力应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在“9·21 大地震”之后，台湾社会与非营利组织在共同受灾、救灾经验的实践、阐述和理解中，一方面对“政府”的无能和缺乏治理之术，提出批判；另一方面不少非营利组织赢得了良好的声望，获得了高度的公信力，给予台湾民众一定的权威感，超过了当局，而社会对公民社会组织已渐渐有所熟悉，一般大众也改变了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疏离、冷落的态度，对由非营利组织进行治理也充满期待，所谓“义工社会”已成为一个号召。在这过程中，台湾的非营利组织对自身的“自主性和公共性”有了比以往更为深刻的理解，而且对自身参与治理也更为自信。当前，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台湾学术界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

## 四、结 语

在台湾公民社会论述当中，公民社会是一个建构中的、可欲的、努力实践的方向，也是一种理想状况。台湾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公民社会的建构，所涉及的关系和所要梳理的层次，相当广泛和复杂，本文无力一一论及，只是从“社区总体营造”和“9.21 大地震”的救灾及灾后重建两个典型事例中，可发现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对于建构公民社会有重大意义。但实际上台湾的非营利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很难做到完全独立自主，过去在威权时期不用说了，政治转型后，虽然有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但要培育起自身的自主性，仍然是个长期的过程。当前，无论是从财政自主还是组织本身的自主性方面，他们都难免受到“政府”或政治势力、企业财团的渗透与干扰。相当多的基金会与社团，成为政治人物或党派、财团势力的“白手套”，这些团体以公益为名遂行私利之实，鱼目混珠，这样不仅不易培植公民社会的根基，反而会对此有所侵蚀。有人认为，“台湾非营利组织的最大隐忧，便是‘社会自治’的根基尚未扎稳，各种政治、经济系统的势力，已透过直接或间接的管道，试图将‘第三部门’再殖民化’”。<sup>[27]</sup>

其实,这种“再殖民化”的最大源头便是台湾当局。我们在“社区总体营造”这样一个官方主导的“新国家认同”重建工程中就可以看到,台湾当局为了重塑“国家权威”,就要从民间汲取资源。李登辉及其周围的势力,借此达到了双重目的,一方面得以消解基层民主的发展对它的威胁,另一方面挪用了民众参与力量和草根资源,去建构自己设定的“新国家认同”。非营利组织的参与,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改良社会的初衷,但在整体上却是依附于“国家”权威,并自觉不自觉地为重塑“国家权威”而服务,其自主性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被伤害。我们注意到,台湾在1993年左右进入社会运动的“低潮期”,发生了所谓“社会力的驯化现象”,而“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的提出和开始实行也是在1993、1994年期间,这恐怕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有内在联系的。因为,非营利组织“被驯化”后如果没有发展出足够的自主性,难免被收编被整合。

然而,从“9·21大地震”的救灾与灾后重建中非营利组织的表现来看,台湾公民社会的建构还是有值得期待的地方。但我们应该看到,“9·21大地震”是一个特殊事件,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统治的空隙中得到了偶然的机会,利用自己累积的社会资本,参与治理,展示了自己的力量,赢得了超过“政府”的声望。在台湾这样的建构公民社会过程中,非营利组织能不能利用这一契机,深化自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最初参与救灾与灾后重建的260多个非营利组织中,坚持到最后的并不多,大多数由于种种原因而中途退出,就显示了这一问题的值得担忧的层面。“9·21大地震”这一特殊事件在现代媒体的帮助下,能够在短时间里刺激一般大众,激发其热情,但要培养广泛而深入的公民意识,显然需要更长期更广泛的公共事务参与机会。

总之,在参与公共事物的治理时,足够的自主性、与“政府”权威之间形成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是非营利组织进行所谓的建构公民社会中所必须的,在这方面,看来台湾的非营利组织仍然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注释:

- [1] 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3月版,《导论》第3~4页。
- [2] 当然,社团等中介机构或者说非营利组织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否一定是正相关,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参见毛寿龙,见其著《政治社会学》第七章第四节《非营利组织与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第242~255页。
- [3] 戈登·怀特,《公民社会、民主化和发展:廓清分析的范围》,何增科译,见《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研究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 [4]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第639~640页。
- [5] 普特南的《让民主运转起来》研究了意大利不同地区的市民社会传统和结构,意大利南部与北部在资源、条件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但两者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为北部地区具有公民积极参与社区生活的传统,而在南部却弥漫着孤独、敌意、互不信任。[美]罗伯特·帕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让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6] 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32~34页。
- [7][8]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第5~6页、第8~9页。
- [9] 郑国安、赵路等主编,《非营利组织与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第21~22页。(下转第107页)

- [8] 梦周：《谒宫记》、梦周：《证件》见《中华日报》1946年11月20日和1947年2月9日。
- [9] 曾健民、横地刚、蓝博洲等编：《文学二二八》，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 [10] 实际题目与梦周所言有出入，可能是当时编辑不谙其中含义而作了改动。
- [11] 梦周：《学校的“衙门化”和“商店化”》、《转移风气》发表于《中华日报》1947年9月16日和6月5日。
- [12] 见《如何扫荡上海风的一些感想和建议》，《中华日报》1947年10月17日。
- [13] 梦周：《漫谈灵感》、梦周：《八千里路云和月 观后》，《中华日报》1947年6月15日、7月4日。
- [14] 梦周：《展开台湾的新文艺运动》，《中华日报》“新文艺”第21期，1947年5月11日。
- [15] 曾健民等编：《文学二二八》，第70页。

（上接第32页）

- [10] [美]莱斯特 M 萨拉蒙等著，贾西津、魏玉等译，《全球公民社会 非营利部门视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 [11]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
- [12] 邓正来，《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见《中国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第50、56~57、64页。
- [13] 冲击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重大事件有尼克松访华、联合国席位被取代、“邦交国”剧减、周边国家和地区陆续出现了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祖国大陆推行和平统一政策等。
- [14] 王振寰、瞿海源主编，《社会学与台湾社会》，（台）巨流图书公司出版，2000年9月增订版，第529页。
- [15] 胡佛，《台湾地区民众对政治参与的态度：系统功能的权力价值取向》，见（台）《变迁中的台湾社会——第一次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资料的分析》下册，杨国枢、瞿海源主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8年出版，第346~349页。
- [16] 萧新煌，《1980年代末期台湾的农民运动：事实与解释》，见（台）“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0期，1991年3月出版，第83~84页。
- [17] [18] 李丁讚、林文源，《社会力的转化：台湾环保抗争的组织技术》，见（台）《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2期，2003年12月第59页。
- [19] “社区总体营造”是一个有着连续性的政策，在“9.21大地震”中的灾后重建中，很多地方的社区重建也归入其中。但这并不妨碍本文所指出的非营利组织在此间的区隔。
- [20] 王振寰、钱永祥，《迈向新国家？民粹威权主义的形成与民主问题》，见（台）《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0期，1995年8月。
- [21] 李丁讚，《权利与共善：从暨大复学案谈对社区主义的反思》，见《迈向公与义的社会——对二十一世纪台湾永续经营的主张》（下），（台）时报文化，2000年出版，第66页。
- [22] 王茹，《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及评析》，见《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2期。
- [23] 谢国兴主编，《协力与培力——‘全国’民间灾后重建联盟两年工作纪要》，（台）‘全国’民间灾后重建联盟出版，2001年9月29日，第10~18页。
- [24] 台湾《经济日报》，2000年9月18日。
- [25] [26] 参见谢国兴主编《协力与培力——‘全国’民间灾后重建联盟两年工作纪要》，（台）‘全国’民间灾后重建联盟出版，2001年9月29日，第83、85-86页、第175~179页。
- [27] 顾忠华，《公民结社的结构变迁——以台湾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为例》，见（台）《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36期，1999年12月。